

Compare the discussion skills of Su Shi's Jia Yi and Fan Zeng

Wanyi Zha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999077, China

Abstract

“Jia Yi Theory” and “Fan Zeng Theory” are two chapters of Su Shi.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Jia Yi Theory” and “Fan Zeng Theory” based on Su Shi's literary philosophy, and explo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discussion skills.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structure and technique of the two articles. Jia Yi Theory sets up different points and adopts various rhetorical devices such as Canon and contrast; Fan Zeng Theory proves the central argument in the form of reverse push, using limited rhetorical devices. However, the two articles have achieved novel ideas, can turn empty surprising, persuasive and artistic appeal in the discussion, which is also related to Su Shi's attention to personality expression, the emphasis on literature and Taoism.

Keywords

“Jia Yi”; “Fan Zeng”; Su Shi; discussion skills

比较苏轼《贾谊论》与《范增论》的议论技巧

张婉怡

香港大学, 中国 · 香港 999077

摘要

《贾谊论》与《范增论》是苏轼的两篇人物史论, 本文将结合苏轼本人的文学理念对《贾谊论》和《范增论》进行比较分析, 探讨其中议论技巧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两篇文章在结构和手法上存在差异, 《贾谊论》设置了分论点, 采用了用典、对比等多种修辞手法; 《范增论》用逆推的形式证明中心论点, 使用的修辞手法有限。但是, 两篇文章都做到了立意新颖, 能翻空出奇, 在议论时说理力和艺术感染力兼具, 这也和苏轼注重个性表达, 强调文道并重的创作理念有关。

关键词

《贾谊论》; 《范增论》; 苏轼; 议论技巧

1 引言

《贾谊论》与《范增论》是苏轼(1037-1101)的两篇人物史论, 前者分析了贾谊本身的性格缺陷, 指出贾谊的悲剧是他自身缺陷导致的, 君主固然要做到知人善任, 但是像贾谊一样的人才也要磨炼自己的心志; 后者分析了项羽对范增起疑心的原因, 指出陈平的离间计并不是项羽生疑的根本原因, 由于卿子冠军宋义、楚怀王和范增之间存在着利益关联, 从宋义被杀开始项羽和范增之间就已经有了隔阂, 如果范增不能及时离开就会性命难保。两篇文章出自同一作家之手, 本文将结合苏轼的文学理念对《贾谊论》和《范增论》进行比较分析, 探讨其中议论技巧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

2 不同之处

《贾谊论》和《范增论》虽然同为苏轼早期所写的史

论文, 但是在谋篇布局和具体的议论手法上都存在差异。

从宏观结构上看, 《贾谊论》设置了分论点, 通过论证分论点的方式层层推进; 《范增论》在提出全文论点之后通过逆推的方式进行论证^①, 逻辑环环相扣。《贾谊论》在全文开头提出了主论点, 认为贾谊“不能自用其才”的缺陷才是造成悲剧的原因。随后, 文章第二段提出了分论点: 想要有一番成就的君子必须做到“有所待、有所忍”。贾谊有才学却不能像孔孟一样做到这一点, 因此, 不是汉文帝没能做到任用贤士, 而是“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贾谊在仕途上遭遇的挫折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本人的性格缺陷导致的。接着, 在第四段中, 苏轼分析了贾谊所处的历史背景, 贾谊进入仕途时只是“洛阳之少年”, 并没有足够的政治资本来实现自己的志向, 在当时不受重用也是合乎情理的, 在这种情况下, 贾谊没能默默积蓄政治资本而是自伤哭泣、郁郁不得志, 沉浸在悲痛情绪之中, 可见他“不善处穷”, 因此, 苏轼在这一段的末尾又提出了一个新的结论“志大而量小, 才有余而识不足”。《贾谊论》通过分层设置论点的方法逐

【作者简介】张婉怡(2000-), 女, 中国黑龙江富锦人, 硕士, 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段剖析了贾谊自身的性格缺陷,从而使得开头“不能自用其才”的主论点更有说服力。《范增论》与《贾谊论》不同,在第二段提出“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的论点后不是围绕主旨设置多个分论点,而是从逆推的方法梳理了“杀卿子冠军”、“杀义帝”和“杀范增”之间的逻辑链条。苏轼认为,是义帝提拔卿子冠军在先,项羽假托君主的命令杀了卿子冠军就必然会激化和义帝之间的矛盾。拥立义帝又是范增提出的建议,当矛盾激化,项羽杀死义帝之后,范增作为提出这项计策的人必然会受到项羽的怀疑,甚至性命不保。不过,在行文时,苏轼提出“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后选择用倒推的方式呈现这条逻辑链。文章在第三段先交代了范增和义帝之间的关系,由于拥立义帝一事的谋划者是范增,所以义帝的生死也和范增的福祸息息相关,义帝被杀后,范增的地位也岌岌可危。然后,苏轼再用“羽之杀卿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的推论引出义帝和卿子冠军之间的关系,卿子冠军受义帝提拔,因此他被项羽杀害后义帝和项羽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水火不容,至此,卿子冠军——义帝——范增之间的联系才得以补全。《范增论》用逆推倒推的方式来揭晓作者的推论,全文从结论处一路倒推,别出心裁,使读者在阅读全文后有水落石出、大彻大悟之感,引人入胜^②。

从具体手法上看,《贾谊论》大量用典,《范增论》仅简述了陈胜吴广起义时打出项燕名号的事迹来类比项羽拥立义帝的举动,其余的部分全部凭借作者的分析和推测进行论说。苏轼在《贾谊论》第三段中先后引用了孔子周游列国和孟子等待齐王接见的史例证明了君子要做到“有所待、有所忍”,如果做到这样也不能得到重用才可以证明是君主识人不清。同时,引用的典故也和贾谊本人郁郁不得志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更能突出他“不能自用其才”的性格缺陷。在文章第四段,苏轼又援引周勃拥立汉文帝和灌婴解决吕氏之乱的旧事,将两人是“高帝之旧将”,有“君臣相得之分”的政治地位和贾谊“洛阳之少年”的身份形成了对比,表明贾谊受汉文帝接见时存在着资历尚浅的问题,缺乏实现政治抱负的资本。苏轼在《贾谊论》中连用了四次典故,两两组和贾谊的经历形成对照,这样的论证方法有效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也避免了文章因议论说理显得单调乏味,使文章富于变化,更有可读性。而《范增论》中大部分内容都在阐释项羽、范增、义帝和卿子冠军之间的关系,并未大量地援引历史典故。虽然苏轼提出了一个逻辑上环环相扣的结论,但是并没有足够的事实依据来证实他的观点,全文的议论只以苏轼一人的分析和推测为基础,说服力有所欠缺,难免有主观臆测、空发议论之嫌,这也与史家严谨治史的原则大相径庭^③,降低了文章在史学方面的参考价值。在文学性上,《贾谊论》能够宕开一笔描述历史人物,随后又紧扣文章主题进行比较,历史典故的加入使文章收放自如、详略得当^④;相比之下,《范增论》就事论事,用典极少,全文以

分析和推论为主,未免稍显单薄,文学性上略有逊色。

综上所述,《贾谊论》和《范增论》同为苏轼所写的议论文,在布局和手法上均有所不同。《贾谊论》在提出论点后用设置分论点的方法分层论证,在证明时大量引用历史典故,全文层次清晰,可信性和文学性兼具。《范增论》在提出中心论点后用类似倒叙的手法逆推项羽从杀卿子冠军到杀义帝、疑范增的逻辑链,布局方法更加新颖,更能引起读者的探究兴趣,但缺乏历史典故的支撑,全文以苏轼本人的假设和推断为主,因此,文章的论点有待商榷,和《贾谊论》相比,在文学性上也有所欠缺。

3 相同之处

《贾谊论》和《范增论》虽然在行文方面有所不同,但是也具有一定的共性,具体表现在立意的新颖性和议论的文学性上。

首先,苏轼在创作史论文时好作翻案文章,常常提出一些不同于大众普遍认知的观点作为全文的论点,《贾谊论》和《范增论》也是如此。贾谊虽有才学却终其一生没有得到施展才华,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后人提及贾谊时或是表达对贾谊的感慨惋惜之情,或是指责汉文帝不能任用贤才。而苏轼在《贾谊论》中将指责的矛头指向了贾谊本人,他指出,“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贾谊的悲剧是他自身性格导致的,他气量狭小又不懂得忍耐和等待时机的道理,因此一旦不受重用就会一蹶不振。贾谊的生平经历固然值得同情,但是后人不应因为这样终生不得志的经历就过度美化贾谊而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汉文帝,在叹惋的同时也要认识到贾谊自身的不足之处。提及项羽和范增的关系,后世大多认为范增最后离开项羽是因为陈平的离间计使得二人离心,苏轼在《范增论》的开头交代了陈平离间、范增离间的经历,却在后续的议论中提到“陈平虽智,安能间无疑之主哉?”,从而批驳了传统的观点。苏轼认为,如果项羽和范增之间毫无嫌隙,陈平的计策是不会起效的,离间计能够成功是因为项羽和范增二人之间已经有了隔阂,这种隔阂的出现就是在项羽杀卿子冠军宋义的时候,宋义死后楚怀王和项羽的矛盾加深,范增又是建议项羽拥立楚怀王的谋士,因此在那时项羽已经对范增有了疑心。苏轼在《贾谊论》和《范增论》中提出的论点都和传统的观念相悖,避免了人云亦云的问题,使文章具有较强的新颖性和独创性。

两篇文章立意的独特性也和苏轼本人的创作理念有关,苏轼性情豁达,好率性而为,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也注重个性独立和创作自由,在《上曾丞相书》一文中苏轼就提到“其所不然者,虽古人之谓贤人之言,亦有所不取”。苏轼反对在创作时循规蹈矩,对所谓的“圣贤之言”全盘接受,他提倡在阅读和写作时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提出属于自己的独到见解,实现“自成一家”。^⑤所以,苏轼在创作史论时也经常翻空出奇,打破传统思维的束缚,用一种不同于主流观

点的视角评判历史人物,使人耳目一新。不过,正如《范增论》的立论有待商榷一样,苏轼的部分史论在作翻案文章时也存在证明观点时牵强附会、主观臆测过多甚至凭空编造史实的弊病,这类文章的史学价值会因此大打折扣^⑥。

其次,《贾谊论》和《范增论》在议论说理时语言风格都具有文学化的特点。第一,两篇文章中都存在着感叹反问等抒情性较强的写作手法,例如《贾谊论》中的“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和《范增论》中的“陈平虽智,安能间无疑之主哉?”都使用了反问的方式叙述观点,增强语气。此外,两篇文章中也频繁出现“乎”、“哉”、“矣”等感叹词,《贾谊论》的“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在开篇处用感叹句抒发了作者对贾谊不能做到“自用其才”的惋惜之情,《范增论》的“不以此时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感叹范增见识鄙陋,在项羽杀宋义后却不能及时离开他,也从侧面论证了苏轼提出的“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独恨其不早尔。”。大多数议论文的作者论述的过程中都将自己置于客观中立的立场中,对个人感情的表达也相当克制,但苏轼在论证个人的观点时也流露出了鲜明的情感倾向,反问句和感叹句的出现使整篇文章抑扬顿挫、情理交融,使以议论说理为主的史论也能生动流畅,具有文学性。第二,两篇文章都借助了修辞手法说理,虽然《范增论》以逻辑推演为主,文学性稍逊于《贾谊论》,但苏轼在《范增论》中也使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他写“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用物体先腐烂才会生虫来比喻陈平的离间计对于项羽范增离心一事发挥的作用,表明只有在项羽已经对范增起疑心之后陈平的计策才能起效,比喻修辞的使用化抽象为具体,用日常生活中的常见情况总结了逻辑推导的结果,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令读者在领会文章论点的同时还能领略到一定的文学趣味^⑦。《贾谊论》在议论时用典,对历史典故的大量引用能够增强观点的权威性,也充实了文章的内容,在表现作者学识的同时提升了文章的趣味性和艺术性^⑧。比如,苏轼在文章中引用了孔孟二人的事迹,尽管在引用史实时没有直接分析贾谊的所作所为,但孔子和孟子游说诸国的经历与上文的“有所为”、“有所待”相照应,和贾谊不受重用后郁闷沮丧一蹶不振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而反映出贾谊本人的性格缺陷,对历史典故的描写既做到了紧扣文章主题,又能使议论的过程更加充实。在创作理念上,苏轼推崇文道并重的文道观,他认为文章不仅仅是承载“道”的工具,还有一种有着客观价值的艺术形式,所以他主张“文理自然,姿态横生”,重视文章本身的艺术性^⑨。受这种创作理念的影响,苏轼在创作《贾谊论》、《范增论》等史论时也注重文章的文学价值,抒情和修辞手法的频繁使用让他的议论文充实晓畅,在论证观点的时候也能具备一定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4 结语

综合比较《贾谊论》和《范增论》两篇史论,尽管它们在谋篇布局和修辞手法的运用方面存在差异,但立意新颖、具有文学色彩和艺术感染力的特征是一以贯之的。苏轼生性率直旷达,因此在创作的过程中也喜好抒发个人的所思所感,重视文章的独创性,同时,不同于韩愈等人“文以载道”的文道观,苏轼提倡“文道并重”,与前人相比他更加重视散文作为一门文学体裁应有的艺术价值。这样的创作理念让苏轼的人物史论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固有文体的限制,这些评论历史人物的说理性散文千姿百态,具体内容和行文布局各有特点,但是它们都做到了兼具说服力和感染力,说理透彻却不晦涩,集逻辑性和文学性于一体,使读者在阅读时耳目一新。

注释

- ①周慧珍:《苏轼论说文的艺术特征》[J],《天府新论》,第5期(1986年10月),页53。
- ②周慧珍:《苏轼论说文的艺术特征》[J],《天府新论》,第5期(1986年10月),页53-54。
- ③吴健鹏:《苏轼史论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页33。
- ④鄢明定:《一篇立意独特的政论范文——苏轼〈贾谊论〉赏读》[J],《秘书工作》,第10期(2007年10月),页47。
- ⑤吴健鹏:《苏轼史论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页34。
- ⑥李青:《论苏轼议论文的写作特色》[J],《文学遗产》,第2期(1985年4月),页80。
- ⑦赵桂珍:《苏轼散文用典简析》[J],《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4期(2008年10月),页:55-56。
- ⑧张大联:《文道并重:苏轼的文道观》[J],《文教资料》第30期(2009年10月),页8。

参考文献

1. 周慧珍:《苏轼论说文的艺术特征》[J],《天府新论》,第5期(1986年10月)
2. 吴健鹏:《苏轼史论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3. 鄢明定:《一篇立意独特的政论范文——苏轼〈贾谊论〉赏读》[J],《秘书工作》,第10期(2007年10月)
4. 邓艳斌:《简论苏轼的文艺创作观》[J],《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3期(2003年3月)
5. 李青:《论苏轼议论文的写作特色》[J],《文学遗产》,第2期(1985年4月)
6. 赵桂珍:《苏轼散文用典简析》[J],《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4期(2008年10月)
7. 张大联:《文道并重:苏轼的文道观》[J],《文教资料》第30期(2009年10月)